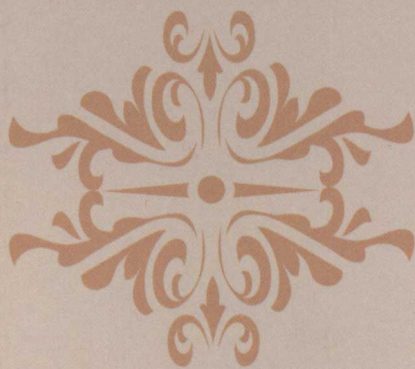


T E S E X U E K E X I L I E

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与价值观研究

何锡蓉 曹泳鑫·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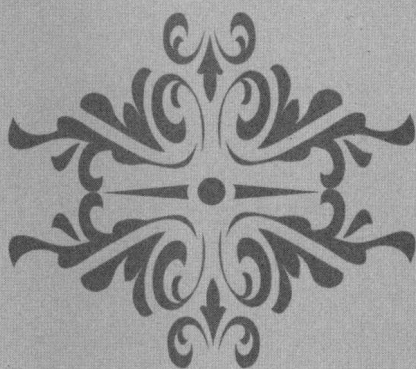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T E S E X U E K E X I L I E

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与价值观研究

何锡蓉 曹泳鑫·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价值观研究/何锡荣,曹泳鑫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45-257-7

I. 核… II. ①何…②曹…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5633 号

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价值观研究

主 编:何锡蓉 曹泳鑫

责任编辑:陈 军

特约编辑:曹文娟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6.25

插 页:2

字 数:286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57-7/D·047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崇善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50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重心。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1959年4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11万字的6个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1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20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9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行为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戊戌变法史论

丛》等相继问世。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为60年代初期全国史学界共同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广大科研人员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题,全力服务于全国和上海的发展,在基础理论和现实应用两大领域着力突破,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成果。

学科是孕育学术杰出人才的摇篮。这里仅以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两个学科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1980年,陈敏之提出住宅是商品的观点,为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和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1985年,雍文远主持的国家课题“社会必要产品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体系创新和理论深化。这两项成果都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外,部门经济研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和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建议》。1983年,部门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1)上海城市经济必须从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向多功能方向转变;(2)上海工业发展必须由拼设备向依靠高技术进步的方向转变;(3)在产业结构方面,必须从优先发展工业向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转变。90年代初,姚锡棠等参与开发浦东研究的学者提出:浦东应建设成为既有金融贸易中心,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在尽量发挥外滩作用的同时,要下决心把中央商务区特别是金融中心放在浦东的陆家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带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而18年来浦东和长三角的发展,正是印证了姚锡棠等人的战略判断。在这个基础之上,浦东新区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共同推进关于浦东改革“先行先试”的战略研究。

1991年11月,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成立。1993年2月,院党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马上参与筹备中宣部1993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组建的5个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地,要发挥骨干作用”,我院被列为全国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确立和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五大基地之一。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共同发挥基础理论与 应用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and 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对我院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要求,也是我院学科建设应当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努力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既重视和加强原有基础理论研究,又鼓励和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于2002年正式确定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经济刑法、上海城市史研究、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等8个重点学科,集中一定的资源推动这些学科的建设。2006年,我院的重点学科增加到12个,除原有的8个以外,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文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同时,批准了14个特色学科,分别是: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借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设置,体现了我院在学科定位、科研理念、科研体制和科研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发生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要求。

近几年来,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一方面为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重要观点、思想和方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服务,许多好的政策建议都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新智库建设正在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实,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既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理论的创新,也离不开应用对策的系统研究。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的重要基础。没有学科建设和创新,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创新,新智库建设也就不会有活水之源。事实已经证明,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就不会有科学性,不会有说服力。因此,在推进新智库建设中,我们必须要以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促进学科发展,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才服

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知识服务。当前,我院学科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形势,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加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力度。

一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夯实研究基础,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基础和科研学术能力是我们的立院之本,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鼓励研究人员以学科发展为载体,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基础理论创新。

二是以促进学科建设提升决策咨询研究和智库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学科建设是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我们鼓励科研人员在开展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申请和承担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以学科发展带动决策咨询研究。

三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培养和开发智库型人才。科研人才是我们的建院之本,智库型人才则是我们建设智库能力之本。我们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术团队成长,一方面注重发挥研究者的个体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更注重推动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团队研究。我们要充分利用社科院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集中反映了我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我院的学科建设一定会为新智库的发展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导 言

何锡蓉 曹泳鑫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

不久前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5·12汶川大地震。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心手相连、患难与共,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精髓,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友爱真诚,先人后己,公而忘私,忍辱负重,顽强坚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心手相连、同胞情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等价值观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的无穷动力。

抗震救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实践,但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已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层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还需要我们做许多工作,包括理论上实践上的努力。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仁们,非常关注社会变革时期的价值体系建构问题,在响应国家号召的同时,积极回应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立足自身学科发挥各自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不同的专业背景出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实践途径等进行探讨,以期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一些理论思考和实践启示。

建设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应当对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历史背景 and 变化特征有所了解和分析。本书的第一部分便着眼于此,其中有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价值观方面发生的变化和重建的论述,有对价值观的现状特征的描绘和背景分析,有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中国价值观的塑造的研究,还有对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现状评析等。

对现状进行分析后,就面临如何来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第二部分中,作者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环境伦理、科技创新、修养方式、廉政文化、素质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探求,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有效途径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而且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内容。在第三部分,学者们重点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了论析,从观念、价值以及普世价值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了理论基础上的探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还应当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构建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在第四部分,作者分别从古典经籍《易经》中,从先秦儒家关于道德品性的思考中,以及从公羊学传统和一些具体的德目中,寻找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身文化资源和传统借鉴。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言之有据。

从现实追溯到传统,从核心价值追问到价值,这是全书终点,也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要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价值是什么、价值与人生的关系如何、价值观与实事求是的关联,价值原则等问题是本书最后部分的重点,作者对以上问题从哲学上给予了解答。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核心价值观进行的探讨,虽然关涉到哲学的不同学科,但学科并不一定全面,也不尽平衡,只是提供一管之见。再者,虽然作者们在论述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目标上一致,但在某些具体观点上也或有见仁见智之处,比如在有否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分歧。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探讨,欢迎学界同仁加入讨论、批评指正,以期为切实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学人的贡献。

2008年6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导 言 / 何锡蓉 曹泳鑫 / 1

当代中国价值观审视 / 1

- 一、现代化的文化变革与价值体系重建 / 1
- 二、我国当前社会价值观状况的特征及背景分析 / 16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承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32
- 四、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主要视点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路径 / 56

- 一、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引领作用 / 56
- 二、“以人为本”与生态伦理 / 69
- 三、“创新”的时代蕴意和价值诉求 / 78
- 四、“崇尚科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 / 92
- 五、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 / 102
- 六、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 112
- 七、“转识成质”：核心价值内化为人民自觉追求 / 127

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论析 / 134

- 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环节的“社会主义”观念溯源 / 134

二、社会主义的制度诉求和价值基础 / 148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普世价值 / 153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 163

一、《易经》和平思想的价值内涵 / 163

二、先秦儒家关于道德品性的思考 / 177

三、公羊学传统与中国道路的价值奠基 / 190

四、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地位与作用 / 206

价值的哲学思考 / 216

一、价值与人生——对普遍主义价值观的批判 / 216

二、价值观和“实事求是” / 226

三、现象学视角的生活态度与“和谐适度”的价值原则 / 238

后 记 / 248

当代中国价值观审视

分析当代中国的价值观特征,离不开对中国近现代以来整个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历史考察,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考察,离不开对中国文化深层变迁的考察,离不开对世界历史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特征的考察,更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深刻背景因素的深层文化洞悉。

一、现代化的文化变革与 价值体系重建

(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中国第一次现代意识的觉醒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利用工业文明这把万能利剑,使整个世界进入殖民体系时代。晚清抵御外来侵略的彻底失败说明,封建的农业文明再也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平行发展、和平共处。伴随中华帝国衰落的,必然是中国整个农业文明社会的结构性嬗变,其趋势必然是开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嬗变与封建文化的衰落。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道:中国人是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期在鸦片战争后,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即经济、军事等物质上的技不如人,于是便有了晚清早期的洋务运动;第二期在甲午战争后,国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晚清人士拿“变法维新”做一面社会运动旗帜;第三期在辛亥革命使清政府垮台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制度建立的民国所希望的事件落空,两次帝制复辟,人们渐渐认识到中国需要全社会人格的觉醒,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下消极的国民人格,保守的文化心理,顽固的道德意识,乃是专制制度死而不僵的魂灵,必须打破封建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文化僵滞之局。这才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在追求物质上的现代化和制度上的现代化依然失败之后,从文化上对现代化的追求

进入议事日程。陈独秀也曾总结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

当然，这里所谓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价值体系，也是文化中最核心、最顽固的部分。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旗号之一便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识的觉醒，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文化自觉。

（二）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抉择——以陈独秀的文化观变化为例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伴随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了各种文化流派，对文化的革新、改造有着多种路径选择。陈独秀也曾是反传统和主张西化的急先锋。五四运动前，构成其人生观和历史观基本内核的是西方个人主义和进化论。他在写于1916年的“人生真义”九条中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应该尊重；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愿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社会的组织秩序之所以应该受到尊重，只是因为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因此社会不能解散，等等。陈独秀早期的这些思想观念，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和怀疑精神，表达了他们以生活进步和个人幸福为基本追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愿望。追求西洋近世文明、批判儒家伦理其目的在于掀动一场道德革命，使国民人格和文化心理得以重建。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思想观点从单纯的文化改造发展到社会改造上。他发表于1919年12月的《新青年》宣言^②，开始向往和倡导“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社会理想，这时的国民人格改造目的，已经不只是满足欲望的个人生存，而是必须希望“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其实现途径已经不只是个人奋斗，而是必须经过“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这种转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之处在于，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启蒙引入到了不仅与政治相结合，而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社会实

^①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1页。

^② 《独秀文存》，第244—245页。

践相结合的社会革命之路。正是在这里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才得到内在的统一,文化自觉才能发展为政治自觉。有了这种政治自觉,他才从原来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转向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才有后来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意识的成熟,而阶级意识的成熟是政党产生的思想和文化前提,即谓“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①。

中国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在中国民主革命时代的开花结果,它不仅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且表现在文化取向上,就是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由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单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启蒙意识,发展到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展开批判。

(三) 先进文化的优秀品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性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蜂拥而起,首先爆发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上的主义之争。其中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论战。而任何一种主义取得胜利都不是由论战本身所裁定,而是必须具备取胜的要素。其要素是什么呢?

首先,必须蕴涵中国社会文化因现代性变革而缺少并急需的文化和现代化资源。也就是说,中国要摆脱封建时代走向工业文明,封建文化将被淘汰,传统价值体系已经残缺不全,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旧存的传统体系脱胎换骨。

其次,必须是世界文明最新进程的文化集大成者。毫无疑问,工业文明是当时世界范围的先进文明,然而最先产生工业文明的欧洲等西方国家,其文化劣根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于世人面前,近现代中华民族对此有着深切认识。因此,“要先进文明,但不要西方列强的殖民文化”,这是民族的呼声,也是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能够与中国现实社会相融,并且融于文化深层和社会整体的变革之中,而不是流于层面和形式。文化的变革不但需要来自社会上的精英文化自觉,而且必须赋予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全社会的革命性动员。五四以前的中国,从技术救国、共和主义到新文化运动,都因不满足这个条件而失败。对于外来文化尤其如此。一种外来文化在未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结合之前,是无法存在下去或发挥其应有社会功能的。外

^① 《独秀文存》,第621页。

来文化在试图改造本地文化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必须根据变化的环境加以调整或被改造,以便被吸收融化并本土化,才能成为一种优势文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一致,而是从一开始就同中国封建文化因性质不同而产生冲突,不相妥协。根据目前理论界的研究,至少存在这些方面的不一致: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圣人史观”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充满辩证法的斗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调和论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以及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忠君观念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规律、尊重生产实践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思想和直觉主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经验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大生产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商品意识并不一致,等等。这些不一致的本质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工业文明时代的先进文化,它与代表封建农业文明的腐朽文化之间的不合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人民民主思想,科学精神,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等所具有的文化特质,恰恰是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所缺少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满辩证法的斗争哲学,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等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又恰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外抗争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要同时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几座大山,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产生彻底革命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本质差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先进分子中传播并不等于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扎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并开花结果,非要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文化自觉并与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不可,这就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中找到自己的接受者、传播者和社会实践者。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进程,使得由此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国这一革命历史时期的最先进文化。

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历史任务,而且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

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并将这种新文化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之一,即:

“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方向,无疑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共同的前进方向。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在从殖民体系向全球主权国家新体系变革的时代,世界范围的反帝浪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等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

新民主主义文化又因其同时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性质而具有历史进步性。“民族的”也就是符合国情的,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问题的。“科学的”本身就是先进的,科学是推动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科学可以消除愚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用科学文化的力量去战胜封建文化的腐朽势力。科学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不竭源泉。科学方法也是文化革命、文化运动、文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大众的”不仅从文化的阶级性上表明其进步性,而且在客观方面,即文化的本性是社会存在的范式,文化只有实现了社会化才能存在下去和发展起来,大众化实质是社会化的最高要求,是先进文化的结构性依托,是社会变迁的活性剂等方面表明其进步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也就是说先进文化需要先将人民群众上升为文化主体,通过大众的文化动员,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实现社会旧有文化结构的变迁,然后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文化。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因此,大众的标准也是实践的标准,是检验文化的先进性标准。

把中国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抽象批判,上升到“为什么人”的实践高度,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观念的革命。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领悟的“庶民的胜利”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就突破了自由主义抽象的“人权”局限,上升到了将无产阶级、普通劳动群众作为现代中国文明主体的认识上。此前,中国文化现代化陷于困境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文化主体定位的迷失。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作为制定全部文化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实践层面使文化成为千百万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通过广泛的文化动员,实现了文化价值系统的转换与文化功能定位的有机整合。这恰恰是那些早期启蒙主义思想

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①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一核心命题，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历史承续

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文化改造进程的这一主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为突出，因为建立新社会必然要求为改造旧社会而实现价值系统的转变，以及为重建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寻求新的文化价值资源。这是新中国文化重建的两大任务。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必将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重建也意味着党的理想追求要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发展相一致，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相辅相成，具有同步性，从而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两种构建形态并存的特殊意义。

基于新中国文化重建的两大任务和文化构建的两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必须继续深入展开，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文化改造的社会动员形式需要继续贯彻和实施。党在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中必须坚持做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主体文化地位与确立新中国人民大众文化主体地位的内在统一。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教育和改造的实践活动。

首先，在全社会普遍开展了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和学习运动，向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农群众宣讲社会发展的规律，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揭露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压迫工人、农民的秘密，揭示旧社会他们受罪受穷的原因。这一教育、学习运动，极大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基础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

其次，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旧的学制、学科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严重地脱离社会和生产的需要，有的甚至与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方向上相对立，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基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全国90%以上的人是文盲。具有悠久历史和弘富文化的中国，由于封建

^① 参见胡惠林：《文化政策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页。